

中國大陸研究天主教的 新趨向

田英傑

在過去幾個月，筆者從事中國大陸學者最近探討西方和基督宗教的研究工作。這是一項十分有趣的工作。筆者在此簡單地概述這類研究的方向，其範圍主要限於天主教會。

就歷史研究而言，北京人民大學一位教授（Ching Xiao）從以下這些角度概括最近有關中國基督宗教的研究方向。他強調一個新的趨向，就是從社會學角度研究基督宗教歷史。他主張假如人們回憶最近有關基督宗教在華傳教歷史的研究，便會容易發現一些清晰的方向：自從人民共和國建國

以來，學者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努力證明基督宗教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工具。這類研究是必要的，但可惜它在某程度上把基督宗教傳教歷史的多方面歸納為唯一的歷史路線，以一連串「教案」引起的政治衝突作為關注的中心。八十年代以後，許多研究者的注意力已從反對基督徒教會的攻擊態度轉變為中西方文化之間的辯論，從而擴大了歷史研究的範圍和方法。然後，有些學者更進一步利用方法學以及宗教社會學的方法，在他們的研究中討論基督宗教，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也作為某些群眾的生活方

式。因此，他們從社會生活的龐大背景中，尤其從它的社會關係和連繫中找出每個特別的宗教，並加以研究；所以，他們從宗教社會學也至少更深入認識社會本身的一部份。這些年間，有關宗教歷史的研究趨向，就是歷史學家從事發掘、改變和反思的過程：他們的觀點得以擴大，從政治歷史到文化歷史，最後成爲社會學歷史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份。

然而，原先的立場是截然不同的。事實上，在七十年代末期推行改革開放以後，學者重新開始研究天主教會時，一直採取狹窄的官方立場，提出以馬克思理論闡釋基督宗教是一種歷史現象。有些作者遵照中國共產黨的傳統路線，嘗試根據官方的意識形態類別來解釋基督宗教在華的歷史。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中國通史簡要》可說是這趨向的範例，比如對於耶穌會士和他們從十六世紀以來在華傳教工作提出完全負面的判斷。文中指出耶穌會士一直被譽爲把西方科學引進中國，但他們並值得受到如此的稱讚。我們知道現代科學的發展，是人類心

靈從神學中解放的結果，而天主教會一直是現代科學的死敵，也殘忍地迫害科學家。該文也談到耶穌會自然地站在對抗科學和科學家的前線，所以很難想象其會士曾經把科學傳入中國。該文認爲，他們盡力阻止中國學者認識由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和牛頓等著名人物所實現科學新發展。

當官方刊物僅以政治和宣傳作目標，有時會再三採取這樣的立場。然而，以下重要的歷史學家和學者努力糾正過去「由極左思想造成」解釋上的錯誤，證明以馬克思主義的基調來解釋基督徒歷史的趨向是存有偏見的。

在知識份子圈子裡，判斷上改變的首個標記見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人民日報》一篇有關利瑪竇（1552-1610）的文章，題目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鋒」，給予他的角色正面的評價。

另外，顧長聲在他的《傳教士與現代中國》一書裡，也採取正面的看法。他承認耶穌會士曾經在明末期間帶來一定數量的科學知識，儘管他本人

並不贊同他們的宗教動機，也指責他們沒有充份注意到要引入最先進的科學知識。然而，據他說，天主教傳教士長時間以來一直擔當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

一九八一年，適逢曾經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年，並有份參與發現「北京人」的著名古生物學家、耶穌會士德日進(1881-1955)誕生一百週年紀念，《大自然》學術期刊記載了甄朔南與黃慰文的署名文章，公開讚揚這位科學家的工作和性格，提出在人們朝著現代科學前進之際，應該對德日進，以及人類歷史的起源提出正確的評價；他們認為把一個朋友當作敵人般對待顯然是有害的；但是，錯誤地把一個朋友指責為敵人，同樣是有害的。至於德日進，他既是良師也是益友，所以人們應常懷念他的良善和優點。

從那時起，一個更正確地、更客觀地評價中國社會環境中基督宗教和傳教士人物的過程得以繼續，而且老實說，現時認真的學者和歷史學家再不

能支持先前有關天主教會既刻板又負面的聲明。這種方法的代表是羅竹風所主編的《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一書。

有關基督宗教信仰在華歷史的進一步客觀研究，引起學者發現基督宗教信仰不但在過去，也在現時中國經歷現代化的過程中所作出的積極貢獻。其中的主要貢獻可概述如下：在經濟方面，強調精神的價值，以保持「兩個文明」（物質與精神）之間的平衡，並提供真正「理想主義的」價值觀，抵抗目前金錢崇拜、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趨向；在政治方面，給予平等、民主、參與、監察當局施政等概念基礎；在文化方面，挑戰中國傳統狹窄的人道主義和實際的關注，並培養有效的服務，為人民在教育、社會、醫療等方面的需要提供實際的答案；在精神方面，集中於邁向真正自由的道路，以及真正「人性」和人類美德的泉源，即天主教在基督內的愛。

Bao Limin 在「基督宗教在轉變中的毛澤東主

義社會所帶來的知識影響」^三一文中，提供了有關部份貢獻的證明文件。他寫道：

很少人首先想到宗教，因為對許多人來說，『啓蒙』等同於民主加科學，排除一切宗教。然而，越來越多學者很快在基督徒思想中認出西方民主制度更深厚的基礎……至於人民參與或人民當家作主這意念，學者一直深思這原則為什麼可以在西方發展，卻未能在東方發展。許多人把這意念與基督徒信仰聯繫起來，因為在天主面前眾人都是平等的……使世俗活動神秘化，使世俗權力神聖化，崇拜政治領袖，正是二十世紀的危機和災難的根源……Zu Xueqian 指出：『透過人神對立的思想模式，透過天主作為絕對的另一位或絕對的挑戰者這觀念，基督宗教已散播民主的種子，貶抑君主制度勢力……』Gan Yuan 抨擊『我們的傳統』的價值一元論。正如他所理解的，基督宗教也是價值一元論，但最重要

的分別是它的一致性存在於天主，而不是中國人所認為存在於大地，因為根據基督宗教，在世上眾人都是墮落的。對許多中國人而言，即使宗教不損害經濟意識，但兩者是不相干的。然而，當更深入討論時，就越來越注意到經濟現代化與宗教之間隱含的連繫……經濟效益要求更認真的道德信條，超過完全享樂的消費主義和不正當的策略……在九十年代，商業主義的世俗化進一步鞏固這趨向。這一切都遇到基督徒對手抵抗，因為他們仍持守著理想主義，儘管是一個跟舊的不同的理想主義，卻與痛苦在一起，並在十字架找到希望。劉小楓孜孜不倦地批評存在主義冷酷無情的虛榮，把它跟基督徒的愛作對比。趙敦華和 Su Jiling 等學者就後現代主義的內在問題發表文章，並提出一個『神聖的文化』對於這新興的範例是不可或缺的。

有關研究天主教會的進一步關注和趨向，就是更新了解和引進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帶來教會的新立場。這時，前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哲學院成員傅樂安教授，聯同他的同事，包括任廷黎、石毓彬和馮嘉芳等教授，經過多年的研究後，於一九九六年完成了由東方出版社所出版《當代天主教》，他在導言中寫道：

本卷主要目的，通過述當前天主教會的改革概況，向我國宗教研究工作者和關心宗教問題的讀者，介紹一些原始資料，提供一些研究線索。可是，由於天主教世界本身極其複雜，各地教會改革情況又極不平衡，試圖把天主教內部發生的一切囊括無遺，顯然是不可能的。即使我們想細心地勾畫出一個輪廓，也難免出現掛一漏萬的缺陷。

一九九八年，傅樂安在意大利發表演講，提出更多有關該書的目的和功能的資料：

有些學者考慮到中國普遍的認識與海外教會的真實情況頗為不同，他們覺得有責任讓中國認識這問題，並決定寫一部有關當代天主教會的書籍。有關的政府機關，當局也考慮到這計劃甚至對於官方的科學研究是十分重要的：：這是第一部在我國出版有關當代天主教會的書籍，也是一項學術工作：：已出版了一萬冊，並獲得公眾的賞識。這類書籍在中國是十分罕有和珍貴的。當然，教會也獲准刊印有關基督徒生活和教義不同題目的書籍，但只供天主教團體傳閱。

自從向讀者，尤其給年輕的知識份子介紹這部書後，他們可欣賞現代天主教的新面貌，並開拓他們的見解和視野。所以，許多人覺得有必要面對客觀的事實，即重新考慮過去的聲明和判斷。因此，當談及天主教會時，不能再好像過去一樣，聲稱它既無知又保守，推論它是反革命和過時的，未經觀

察分析便抗拒它。現在，許多人已克服種種偏見，開始重新考慮教會，透過分析和評價它目前的具體現況而更加認識它。

以上的引文談到天主教作者的著作主要供教會內部傳閱。這些知識份子通常具有其他特殊寫作目的，例如回應信友在禮儀、道理和教理等方面的實際需要，介紹普世教會的最新訓導，報導其他地方教會的要聞等。他們也剛開始培養基督徒教義更能體現於中國社會及文化環境中，即是所謂基督徒信仰和福音融入環境及本位化的過程。

這樣的過程看來是十分重要和有意義的，其目標是讓天主教教義及神學詞彙跟普羅大眾、世俗的談話，以及其他宗教傳統所採用的語言協調。他們應幫助天主教信友以大多數同胞容易明瞭的方式來表達和解釋他們的信仰。這項工作的另一個方向，就是把基督徒價值觀加插在公眾的談話，和大多數人的意識裡，好能完成文化交流的過程。

這類工作不過是剛剛開始而已。中國的天主

教知識份子急需與其他學者及歷史學家緊密合作，履行如此複雜的過程，好能擔當更積極的角色，為中國社會未來的新價值架構奠下基礎，並為中國目前經歷的價值轉移及文化轉變作出貢獻。 □

註釋：

ⁱ 見 Ching Xiao, 「從社會學的角度深化現代基督教研究中心」，收錄於《文史哲》，1996年第2期，第32-33頁。

ⁱⁱ 《中國通史簡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ⁱⁱⁱ 該文收錄於 *Theology Today*, Princeton, Vol. 55, Issue 4, January 1999, pp. 532-546.

^{iv} Fu Lean, "Lo spirito del Concilio Vaticano II in Cina", in *Asia News*, Supplement to *Mondo e Missione*, No. 4 (April 1998), pp. 55-58.